

故宮黃綾本《玉皇經》在道教經典史上的價值*

謝聰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提 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珍藏了一本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黃綾定本《玉皇經》，此善本可說是目前道教《玉皇經》研究中的重要版本，因為它保存了南宋以來的轉經儀式完整經本，與豐富而有用的序跋資料。其在道教經典史的價值，主要可歸納如下：一是根據附錄的南宋程公許兩篇〈玉皇經跋〉，不僅可以考察當時四川蜀本的形式，瞭解其流變的軌跡；更可追溯最初《玉皇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二是元人黃日新的〈序〉與〈校勘記〉，不僅詳述《玉皇經》重要版本的來源與演變；並利用當時《道藏》相關資料校正，逐一指陳他所見湖南地區《玉皇經》版本的內容與訛誤。三是經由黃綾本所保留的誦念《玉皇經》文前的「啟闕」（請神）文字，比對《正統道藏》本《文昌大洞仙經》（CT5）卷一、卷二，可證實二者出自同一系統；可推論《玉皇經》出世的地點應在四川蓬溪縣，且由劉安勝道壇後輩的乩手扶鸞書出。四是卷末所附的四十四則誦經感應故事，承擔了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上可考察其故事的來源與變化的情形，探索其中內含的意義，下可追索之後版本中保存的痕跡，以明瞭相關版本的關係。

關鍵詞：道教、梓潼、扶鸞、玉皇經、程公許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李豐楙教授指導，投稿後又得到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修正意見，特此誌謝。

一、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珍藏一部罕稀善本《玉皇本行集經》(下簡稱《玉皇經》)刻本,題名為《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下簡稱故宮黃綾本)。「黃綾」為黃色、光滑又有花紋的高級絲織品,「黃綾本」乃以黃綾套袱封襲裝潢的書籍,表示其尊貴與皇家使用,自古以來即作為皇帝御覽、宮中祕閣珍藏的定本,並為書寫皇家相關資料的封面裝潢。如北宋朱弁(1085-1144)撰《曲洧舊聞》卷一,載北宋哲宗所看的內外臣僚所上章疏,需經過繕寫後再以黃綾裝背;¹北宋末李燾(1115-1184)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六〈仁宗〉,則清楚載明藏之於祕閣之書,如《太平御覽》一類皇帝御覽圖書,都必須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²南宋王應麟(1223-1296)撰《玉海》卷五十一〈藝文·玉牒圖譜〉也載:「景祐五年歲(北宋仁宗,1038),寫皇族名位一編,黃綾裝題。」另外臣子上呈皇帝省覽的著作,也均強調黃綾背褙、黃羅絹裡與封裝的完美,如南宋錢時撰《融堂書解》卷二十載萬一薦嘉熙二年(南宋理宗,1238)九月上進的〈宋進書原劄狀〉,繕寫錢時所著書計一百冊上呈理宗:「用黃綾背褙,黃羅絹裏,夾複五條,象牙牌五面,紅茸條繫,綵畫木匣五隻盛貯,鍍金鐵鎖並全。」而與此《玉皇經》同時期,隨表謹呈御覽的著作,也一樣遵循「黃綾套袱封襲」的傳統,如明湛若水(1466-1560)撰《格物通·卷首表》嘉靖七年(1528)六月初一日載:「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并序纂要目錄,共為二十八冊,黃綾套袱封襲,謹隨表上進,以聞。」

這個故宮黃綾本揭示於網路上的資料:題為梓潼帝君校,明成化九年(1473)大字刊本、善本。經申請調閱後細看,其刊行格式如下:(1)總共有三卷,分裝三冊:首冊卷一計224面、中冊卷二計152面、卷三204面。(2)封皮黃綾裝潢,中有內黑外紫紅框,墨書題名。(3)內文經摺裝。(4)書版長寬尺寸為44.2公分與15公分。(5)經文大字(約3×3公分),行列為一面4行,每行11字;小字則一面8行,每行22字。而經文形式為:(1)卷一至卷三不分章,無天

1 北宋朱弁(1085-1144)撰《曲洧舊聞》卷1:「宣仁同聽政日,以內外臣寮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為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又如清人顧嗣立(1669-1722)編《元詩選初集》卷40貢師泰(1298-1362)《玩齋集》〈明仁殿進講·五首之二〉:「黃綾寫本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從容聽講罷,許教留在御床邊。」(以下古籍版本未註明出處者,皆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

2 北宋末李燾(1115-1184)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6〈仁宗〉:「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為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

樞上相張良校正註解，卷二刪去雲篆符文。³（2）平闕格式只用闕字，不用平抬，除闕字為行末之外。（3）難字則在其旁標出同音異字或反切。（4）校正說明則標於其旁小字，或眉批於當頁上欄天位。以筆者的認知，故宮黃綾本可說是目前道教《玉皇經》研究中相當重要的版本，因為版本中提供了豐富的訊息，有助於解決目前研究的困境：即關於最初版本出世的時間、背景與因緣，以及歷代相關版本流變等問題，一直沒有明確而令人信服的證據。若隨著這個版本所載資料的一一解讀，並配合其他文獻的深入探討後，應該能讓以上問題有清楚釐清的機會。

筆者有幸看到並抄錄故宮黃綾本後，已努力寫出了〈《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投稿審查中）與〈《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⁴兩篇論文。前者就目前學者對其成書時間的諸多推測：針對隋末唐初、唐代與北宋、南宋後等多種說法，一一提出論辯後，提出新證據闡明其成書因由與過程，並斷定成書時間為南宋中期。後者則因未有學者就此問題提出論述，筆者以故宮黃綾本所保留的原佚失資料——程公許（1182-?）在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庚子歲（1240），為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刻蜀本中所寫的〈玉皇經跋〉，以他自己歷官於蜀地與參與相關道教的活動經驗，見證般肯定地說出：「蜀敵難，七曲託鸞大書，以此經勸誘課誦。」經縝審比對當時史料與考證辯析後，進一步論斷了《玉皇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以及梓潼帝君之所以託鸞出書的意義內涵，並推論可能的扶鸞道壇與地點。此故宮黃綾本因借閱不易，流通有限，所以本文除先介紹其形式結構，釐清其版次時間，考證其主要刻校者元人黃日新的資料外；將深入分析此本所保存的南宋程公許〈玉皇經跋〉的重要價值，並且詮釋此版本所提及的相關版本的意義，以及其後所附〈誦經感應〉四十四則的貢獻。

一、故宮黃綾本的結構、版次與刻校者

（一）故宮黃綾本的結構

故宮黃綾本不僅是一本可實際運用於儀式轉經的科儀完整本，又是明朝皇帝

3 〈黃日新序〉：「至于天篆符文、密呪，乃上學之士，佩服修行所用，萬中無一，故不翻行。」

4 本文已獲《道教研究：宗教、歷史與社會》創刊號審查通過（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共同發起出版的學術期刊），待通知出刊日期。

御覽的黃綾定本，所以結構內容就較一般通行版本豐富許多。若按其儀節先後順序，可大分為二十二部分：（1）傳經圖一幅，（2）明嘉靖御製碑文，（3）序：《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序》（題：天猷副元帥沖和應善天尊普化天尊製），（4）黃日新序（元泰定元年，1324），（5）誦經警策，（6）啓闕：甲神咒、乙發爐、⁵丙請神（志心皈命禮）、⁶丁求哀懺悔（臣等自從無始劫）、戊志心發願、己禮謝無上至真三寶、庚經首詩（太上彌羅無上天），（7）開經咒（善哉元始），（8）入經文：卷上經文。至卷上畢，（9）廣成子先生曰（此卷中開頭，在經文前），⁷（10）太微仙君功過格律（部分，在卷中經文前），⁸（11）黃日新校勘記（元刻諸本舛訛說明，在卷中經文前），（12）卷中經文，（13）程公許〈玉皇經跋〉二篇：甲宋嘉熙四年庚子歲閏月嘉平日（南宋理宗，1240，

-
- 5 依序為：〈淨心口神咒〉、〈淨身神咒〉、〈安土地神咒〉、〈淨天地神咒〉（後另有四行小字咒語）、〈五星神咒〉、〈金光咒〉（有功訣）、〈發爐〉、〈玄蘊咒：雲篆太虛〉（後多「沈滯能自痊，塵勞溺可扶。幽冥將有賴，由是生仙都。」）
- 6 〈長跪禮奉：仰啟玉清境〉後，接三十五組不同志心皈命，禮請頌文：1.無量度人元始天尊、2.無量度人靈寶天尊、3.無量度人降生天尊、4.光嚴妙樂國王聖父天尊、5.寶月光皇后聖母元君、6.穹蒼聖主玉皇天尊、7.現無量功德之身玉皇天尊、8.現清淨自然之身玉皇天尊、9.現神明堅固不壞真空無上法身玉皇天尊、10.分身應化玉皇天尊、11.玉帝應身清淨自然覺王如來、12.經筵啟問高虛清明天帝帝君、13.天地始祖五老上帝天尊、14.法筵啟問玉虛大帝、15.經筵啟問昊天上帝、16.慈悲度厄真人、尋聲救苦真人、濟生度死真人、萬福護身真人、17.傳經演教歷代祖師神仙聖眾、18.太乙尋聲救苦天尊、19.校經主宰天樞上相法主道君天尊、20.北極真武佑聖真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終劫濟苦天尊、21.三天上相玄都丈人扶教度人大法天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降魔護道天尊、22.四眾八部大乘菩薩梵天一切金僊、23.夜光玉女、一切元君、24.九千萬人諸真聖眾、侍衛左右妙行真人、25.自然大僊、天真皇人、26.遵奉帝敕護持經人周流沙界神僊兵馬、無鞅聖眾、27.無極真元清皇上帝九天寶冊司命天尊、28.先聖至聖文宣王興儒盛事天尊、29.三天次相九炁丈人丹霖大帝無量度人天尊、30.九天開化主宰七曲靈應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生永命天尊、31.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太乙定命至道玄應神功妙濟真君、32.神仙感應妙通丹華慈濟文顯真君定光澄明普度天尊、33.雷主中天火歛律令炎帝天君太乙雷聲普化天尊、34.雷霆都司元命真君蓬萊都水使者雷聲應化天尊、35.十方帝君諸仙聖眾神僊兵馬十極神王……醜筵感應一切真靈。
- 7 廣成子先生曰：「道藏經書數幾多，二兆五億七萬過九千三百八十一，半在人間半大羅。經通天上所有者，計一百九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卷，人間即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至元壬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焚歸大羅。」按戊午年（元憲宗八年，1258）年起至元十七年（1280）的多次釋道辯論與爭執中，道教失敗，元世祖遂下令焚燬《道藏》（1244年刊竣之《玄都寶藏》）經版。《元史》〈本紀第十一·世祖八〉：「（十七年二月）丙申，詔真人析（祁）志誠等，焚燬《道藏》偽妄經文及板。」但此次未盡焚毀，所以至元十八年又再次下詔焚經，據〈聖旨焚毀諸路偽經道藏經之碑〉（《佛祖歷代通載》卷21）所記：「戊午年（1258）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偽經始末，可書其事於後。」「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版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又釋道辯論與爭執，請參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確執〉，頁142-202。
- 8 按《正統道藏》本《太微仙君功過格·序》西山會真堂無憂軒又玄子序曰：「余於大定辛卯之歲（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可知《太微仙君功過格》出世於1171年，此只節引〈功格三十六條〉內誦經功德經文（5a），與〈過律三十九條〉內誦經、寫詞章時犯過部分（9a-12b）。

蜀本)、乙淳祐壬寅春四月己巳(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記猶子任感驗,內提到孫文煥校定注解之蜀本), (14) 仰居士刊施《玉經》正本來歷感應事蹟(歎識:宋淳祐八年(南宋理宗,1248)歲次戊申正月九日新安祈山受籙臣仰有大法名崧真書。至此卷中畢), (15) 卷下經文, (16) 補闕:誦經後念十遍《玉經》纂補闕(志心皈命),⁹ (17) 經尾詩,¹⁰ (18) 回向懺悔文(龍章鳳篆), (19) 稽首稱念(道經師), (20) 念收〈金光咒〉(即如復爐), (21) 經後附四十四則感驗故事,¹¹ (22) 護法神圖:(應為天猷副元帥)。

(二) 故宮黃綾本的版次時間釐定

故宮黃綾本電腦資料題為明成化九年(1473),按此版次不是黃綾定本的最後時間,乃採用卷三所附誦經感驗故事最後一則〈施玉經伏惡賊退散得祿職陞遷〉,發心施資、命工刊梓印施的明人黃琛所記時間。按黃琛確有其人,據明代王恕(1416-1508)撰《玉端毅奏議》卷一所錄,其於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三月二十七日所上的〈查勘失機官員功罪奏狀〉中,就有「安陸衛指揮同知黃琛」。比對這則誦經感應,一開頭即言:「時成化丙戌(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安陸衛指揮同知黃琛發心書寫《玉經》十二部,散施人天。」可確定為同一人,且黃琛可能於成化二年遭受彈劾降職後,懺悔發心寫經;並為求官進職,爵祿亨達,其後於「壬辰(成化八年,1472)上元令節,命道士江玄微于家焚香,告盟天地,再捐己貲,命工鋟梓《玉皇本行集經》,印裝百部,以施善信,流通讀誦。」沒想到印經後八個月內,就重蒙皇恩陞授指揮使職,因自認乃施經之功德力,所以於成化九年(1473)又印造《玉皇本行集經》壹百部,以答謝神恩,並祈賜福。

這則感驗記也被保留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直解》¹²

-
- 9 金闕玄穹至高上玉皇尊諸佛聖師萬天帝主,演三卷五品之妙法,周十號萬德之洪名,放十七大光明,示三十種功德。拔度生死,運化古今,一萬二千三十六字,《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 10 金書玉字妙難思,誦者天真必護持。三十願成皆仗此,志心歸奉莫教疑。
- 11 〈黃日新序〉:「今日新得仰本四十件感應(按1324年後多4件),即採諸經新驗者數端,用廣其傳,以斯功德,上報四恩,下資眷累,解冤懺罪,長福消災,長賴人天,普資利益者。」又言:「持誦《玉皇經》應驗,不可泯沒,刊列于後。」
- 12 筆者所見為雍正十三年(1735)舊刻、光緒十九年(1893)重鐫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直解》(下簡稱《直解本》),臺灣老道壇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均藏有此版本;而《重刊道藏輯要》大體依照此一版本,故卷中頁25亦引述相同文字。相關版本流變將另文考證。

卷中經文：「若爲求官進職，爵祿亨達，貴遇人君，如法持念是此真經。即得職務遷轉，子孫榮貴，世世不絕。」下引證黃琛刻經施散功德：「安陸衛千戶黃琛，久不遷官，發願刊印《皇經》一百二十部以施善信，裝訂甫成，即陞正指揮使。」按此引證核對黃琛自述，雖然印造經數略有差異（112本與120本），但可推知《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直解》所根據的版本爲明成化七年（1473）黃琛第二次刊印的一般流通版本。然而，這應不是最後故宮黃綾定本的時間，因爲在卷一「傳經圖」之後，第六頁的石碑圖刻，清楚地署明時間爲「御製 嘉靖辛酉（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其下並有四行文字：「天地覆載，日月光明。玄靈顯應，道法隆興。氣含靈機，功參妙運。感而遂通，求之則應。輔正祛邪，演經成訓。玉笈琅函，瞻者起敬。」所以說最後的版次時間應爲嘉靖辛酉年，此「御製」兩字，正顯示其作爲「黃綾定本」的尊貴身分。

（三）主要刻校者黃日新考證

故宮黃綾本《玉皇經》保存了1324年版次出版前，元人黃日新的〈序〉與〈勘校記〉，這位刊校者在《玉皇經》的出版史上有非常大的貢獻，也應是讓此本《玉皇經》可稱之爲善本的原因。他不僅詳述其版本的來源，並利用《道藏》相關資料校正經文，逐一指陳當時所見湖南《玉皇經》相關版本的形式與訛誤，還抄錄了南宋程公許的兩篇〈玉皇經跋〉，爲後人留下可據以考證的珍貴史料。從其元泰定元年歲次甲子（1324）上元所寫的〈序〉，自署「三洞五雷洞淵經籙清微冲道使通玄明善法師潭州路玄學提舉北十壇開基焚修香火黃日新焚香再拜謹書」（卷上，頁10），可知其深厚的道教背景；雖此元人黃日新不見相關經傳記載，但據故宮黃綾本卷中前面自述其刊刻《玉皇經》的時間與因緣，可多少瞭解其相關背景：

吉安法師黃日新自至元甲士遷居長沙，緣率眾建斗壇，崇奉香火，誦經苟活。（至）至治癸亥，僅三十年，多有積愆未退，懺謝四恩莫報，有愧人身。今則日新減日薄（薄）味，戒葷持素，日逐誦經，以所傳經俸，命工刊刻《玉皇本行經板》一部，敬用懺雪辜愆，超昇祖禱。日新用心半年，親手編寫，命匠雕刻，常時點視。（卷中，頁25）

按吉安指元朝時江西吉安路，應指其本是江西吉安人，而後會遷居到湖南長沙的重要原因就是「至元甲士」。所謂「至元甲士」，應指其經歷過至元年間的戰役，即指至元十一年（1274）至十三年（1276）間，元軍進攻襄陽而後攻陷南宋首都

臨安的重大戰役。¹³ 黃日新遷居長沙十數年後，遂緣率眾建立斗壇，崇奉香火；到了元英宗至治癸亥（1323）年，亦即設壇誦經行道三十年後（1293-1323），始得仰有大的刻本（按1247年蜀刻本，文中曰正本，下詳），經半年親自編寫校勘，終於在元泰定元年（1324）上元寫序後不久出版。其自署的「三洞五雷洞淵經籙清微冲道使通玄明善法師」，是其依道教傳度受籙的法職；「北十壇開基」中的「北十壇」，應即是他〈自序〉中所說的「緣率眾建斗壇」的壇號；至於「潭州路玄學提舉」¹⁴一職，則是他的道官職稱。

「潭州路玄學提舉」中的「玄學」，應指稱研習道家學說或所建之道學者。據《宋書·隱逸傳·雷次宗》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以立「玄學」：「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長安、洛陽兩京即各設「崇玄學」，召集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與《文中子》等，每年准明經考試。玄宗又增「道舉科」，自此，精習道經玄典之士，得以專力攻獵此科之名。¹⁵ 南宋王應麟（1223-1296）撰《玉海》卷一百十二〈學校〉也載：「宋朝政和八年（北宋徽宗，1118）八月庚午建道學。」至於元代玄學的狀況，史傳多有高道興學與講學的記載。如元人趙孟頫（1254-1322）撰《松雪齋集》卷九〈碑銘·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按真人即杜道堅：據明人董斯張（1587-1628）撰《吳興備志》卷十三〈杜道堅〉：「字處逸，號南谷子，采石人。年十四得異書，師葛蒙庵，為茅山道士，

13 據《宋史》卷47〈本紀·度宗〉咸淳十年（元世祖至正十一年，1274）九月：「癸未，大元兵大會於襄陽。丙戌，丞相伯顏將一軍趣鄂州，元帥唆都將一軍入淮，翟招討將一軍徇荊南。丁亥，大元軍薄鄂州。」德祐元年（至正十二年，1275）：「大元兵徇沙洋城，京湖宣撫司遣總管王虎臣援之。丙寅，城破，虎臣與守隘官王大用皆被執。」德祐二年（1276）正月：「文天祥、尹臨安請以二王鎮閩、廣，不從，始命二王出關。大元兵迫臨安，宗親復以請，乃徙。封昱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曷為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俞如珪為提舉。大元兵至臯亭山，鎮等奉之走婺州，丞相伯顏入臨安。」

14 「玄學提舉」一職，亦見於清人牛誠修輯錄的《定襄金石考》卷3所載元大德五年〈集賢庵創建觀音堂功德之碑〉，末署「勅賜大清萬壽宮三洞講經大師太原路玄學提舉，賜紫，周希智篆」。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之13，頁10014。

15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續）〉，文長分別收錄於《道教文化》第4卷第8、10、11期。本文所引之處在第11期頁22，其言：「唐人道舉科應試得中者，其人數難詳，可考者，祇僅元載、陳少遊、獨孤及、李棲桐、姚子彥、靳能、盧復、竇滂等。」史料文獻可參見《舊唐書》卷9：「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考試。」《新唐書》卷44：「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

居武康昇元觀。宋皇慶間（按南宋無皇慶年號，疑為元仁宗皇慶，1312-1314）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又元人劉將孫（1257-?）撰《養吾齋集》卷二十二〈記八·萬安祐聖觀〉：「道士蕭獨清，以詩行四方，為名公先進所稱，嘗提玄學，西山滕玉霄大書。」又元人袁桷（1267-1327）撰《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題跋·吳饒公制書跋〉：「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按吳全節，1269-1346，元著名玄學大師），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舛蠶之說，悉所不取。」再如明朝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九十四〈著作記第四·南華正義〉：「唐劍南道士文如海著，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鋟諸木，歲久不傳，元玄學講師錢大中翻刻之，吳澄序。」清人朱彝尊（1629-1709）撰《經義考》卷四十八〈吳全節序〉曰：「昔世祖皇帝既定江南，首召三十六代天師入朝，未幾，天師奉旨掌道教。還山，遂禮請先生（按雷思齊，1231-1303）為玄學講師，以訓迪後人。」

「提舉」意為主管負責，在中國古代提舉一職與教育明確有關係者，較早見於北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在地方諸路創設具有教育督導意義的「提舉學事司」。¹⁶張雪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傳播史上，設立最早的專管州縣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機構。其負有督導管理教育傳播的職能，包括對地方教育政令的傳播貫徹，和對學校教育的視察、監督、考核和指導等。¹⁷而南宋何夢桂（度宗咸淳元年進士，1265）撰《潛齋集》卷五〈玄學史提舉序四明人轉委徐雲墅求序文〉，也見載史存初擔任「提舉玄學」之職：「存初高士，提舉玄學，史志潛宋故參相。」元初繼承此一制度，於《元史》卷十〈本紀·世祖七〉十六年記明：「又請各路設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專領課程，從之。」按以上考證可知，黃日新的官職正是湖南潭州路玄學的主管負責官員，所以其能掌握到湖南地區所有《玉皇經》出版的狀況，而進行仔細的校正。

〈黃日新序〉文不僅交代天樞上相張良校正《玉皇經》的時間，和之後的重要版本流變，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仰有大「正本」¹⁸載有程公許〈玉皇經跋〉：

16 《宋史》卷197〈職官志·職官七·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北宋徽宗，1103）置，宣和三年（北宋徽宗，1121）罷。」

17 張雪紅，〈論宋代提舉學事司的創制與其在教育傳播中的督導功能〉，頁195-199。

18 故宮黃綾本黃日新所得的「正本」，指1247年付梓，1248年印出的「仰有大正本」。然又據其書卷中，所保存的〈仰有大跋〉（自署「宋淳祐八年歲次戊申（南宋理宗1248）正月九日新安祈山受籙臣仰有大，法名兼真書。」），則謂1225年的東蜀梓潼帝君校本為「正本」：「近得東蜀

今日新得其正本，自宋嘉定辛巳年間天樞上相校正，越五年，寶慶乙酉十月五日，梓潼帝君復校正數字；又越十有六載，乃嘉熙四年庚子歲，間朝貢程學士公許作〈跋〉；再歷八載，淳祐七年丁未，仰有大居士鏤梓，印施千卷。嗟乎！自仰居士施經，至至治癸亥七十六年，經隔幾手，傳之不一，魚魯成曾，烏焉為馬，訛謬愈甚。今來日新得之仰本，自抽經俸，板行于世，就抄錄程學士所跋，仰居士施經感應因緣，刊于卷末，庶知來歷。（卷上，頁8）

從「宋嘉定辛巳年間（南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天樞上相校正，越五年寶慶乙酉十月五日（南宋理宗，1225）梓潼帝君（張大帝）復校正數字，又越十有六載，乃嘉熙四年庚子歲（南宋理宗，1240），間朝貢程學士公許作〈跋〉。」這一段敘述，對照李顯光所藏明·永樂版《玉皇經》前後的序跋，¹⁹可證實1221年在四川蓬溪縣真一壇申請天樞上相張良校經，1225年梓潼帝君再校修正的歷史，以及與《郡齋讀書志》卷五上〈附志·經類〉的記載程公許作〈跋〉之事完全符合。而黃日新重刻的版本，主要就是根據仰有大居士淳祐七年丁未年（南宋理宗，1247）的版本，這個版本中就已刻出程學士的二篇〈跋〉，如今日故宮黃綾本所錄；而從1247年刻出的仰有大本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校正付梓的黃日新版，正好是經歷七十六年。

二、南宋程公許〈玉皇經跋〉的重要價值

《玉皇本行集經》經名不見錄於南宋前成書的任何重要書目文獻，直到《郡齋讀書志》卷五上〈附志·經類〉方載：「《玉皇本行集經》三卷：右嘉熙四年（南宋理宗，1240）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刻蜀本也，程公許〈序〉述為詳。」²⁰《郡齋讀書志》四卷是南宋晁公武（孝宗隆興二年仍在世，1164）所撰，而南宋趙希弁²¹（晚於程公許）重編〈附志〉一卷：據〈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序〉

正本（嘉熙四年，1225），看詳卒章，該載應驗事蹟三十餘條，有生死患難、兵刃、商賈、科第之人，凡有敬仰，皆蒙其惠，誦之，使人凜然。」

19 請參見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推定〉一文考證。

20 按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 1920-）《宋代收藏道書考·宋代館閣及家藏道書綜錄》一書所引，亦即此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杭州臨安府承天靈應觀蜀本。

21 曾撰〈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序〉，收錄於其所著《郡齋讀書後志》卷1前，其自署「淳祐（1241-1252）庚戌日南至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書籍趙希弁謹序。」《四庫全書·郡齋讀書志提要》考：「希弁，袁州人，宋宗室子，自題稱江西漕貢進士秘書省校勘，以輩行推之，蓋太祖之九世孫也。」

言：「昭德先生（晁公武）校井氏書為《讀書志》四卷，鄱陽黎侯傳本於蜀，刊之宜春郡齋；且取希弁家所藏書，刪其重複，摭所未有，益為五卷，別以《讀書附志》。」《四庫全書·郡齋讀書志提要》也本此說：「淳祐己酉（南宋理宗，1249）鄱陽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書目參校，刪其重複，摭所未有，益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為袁本。……〈附志〉一卷則希弁家書，故兼及於慶元（南宋寧宗，1195-1200）以後也。」

藏於趙希弁的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刻蜀本《玉皇經》版本中，此則資料在《玉皇經》的研究上可說最為明確與重要，因為至少可以斷定三卷本《玉皇經》成書的刻本早於1240年，而且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根據的是「蜀本」；加上其說「程公許〈序〉述為詳」，可見程公許的〈序〉必定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可惜的是這篇重要的文章未流傳行世的版本，才會造成有關版本與時間的諸多猜測。據故宮黃綾本《玉皇經》，其中南宋程公許親自署名的是〈跋〉而非〈序〉，而且共有兩篇。由於這兩篇〈玉皇經跋〉（以下簡稱二〈跋〉）的重新問世，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進而可與筆者所蒐集到的不同版本與歷史文獻作對照考證。

（一）程公許二〈跋〉透露所見「蜀本」的形式

《郡齋讀書志》卷五上〈附志·經類〉載程公許所〈序〉的《玉皇本行集經》，乃是三卷本形式的蜀本。又據黃日新本記載程公許署名的是〈跋〉而非〈序〉，卷中後共保存兩篇，分別寫於1240年與1242年，在1247年的仰有大刻本中即被載入，其提到的共有三個版本形式：

《玉皇本行集經》有天樞上相張真人校正表文，及逐章注解，敘述誦持大義；北極天猷副元帥為之〈序〉；七曲靈應張大帝為之〈跋〉，發揚奧旨，開度天人，詳且盡矣。……鄉人欲此經之廣於東南也，捐金鋟木，寘之杭州承天靈應觀，公許敬為識本末於下方。宋嘉熙四年庚子歲閏月嘉平日，朝奉大夫將作少監兼直舍人院兼尚左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臣程公許拜手謹書

《玉皇本行集經》近歲天樞張上相託鸞為之注解，公許徃歲既為鄉人拜手書〈跋〉矣。後二年，淳祐壬寅（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春二月甲戌，猶子貢士子任，忽染寒疾，誤投涼劑；越三月，丁亥，病浸革，精神煩悶，長少環泣，莫知所為。……先是子任避地遠來，篋中攜鄉人

前彭山主簿孫文煥所校定注解經本，出蜀，誦持惟謹；中間所刊龍章鳳篆，皆以藏教經本訂正，可信不誣。視今所刊，尤為詳盡，子任用是捐金命工，悉加改正，俾見誦持，同獲無邊勝利。……此經靈驗事蹟，前後不知其幾，蜀中所刊，久已成編。今姑以蒙被 恩貸一事，紀于下方，以堅正信之心。 是歲夏四月己巳程公許百拜謹書

據《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記載，程公許於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二年被彈劾去差，至嘉熙四年庚子歲（1240）因李宗勉入相，重用程公許留在臨安：「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遷將作少監」與「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直到1241年離開中央，以「直寶謨閣知袁州」，所以程公許自署官職為：「朝奉大夫將作少監兼直舍人院兼尚左郎官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是合乎史實的記載。又程公許是四川眉州人，所以二〈跋〉文所稱的「鄉人」，自是同鄉之人，廣義則指四川蜀人，狹義則指四川眉州人，如後則明確點出「彭山」，即指四川眉州彭山縣（離蓬溪縣約140公里）。而「鄉人欲此經之廣於東南」，指稱的就是杭州承天靈應觀的《玉皇本行集經》，其所依據的版本自是三卷的蜀刻本：依1240年〈前跋〉所言，其版本形式乃：「有天樞上相張真人校正表文，及逐章注解，敘述誦持大義；北極天猷副元帥為之〈序〉；七曲靈應張大帝為之〈跋〉。」依筆者考證，這個版本就是明永樂本所載1225年梓潼帝君校正的科儀新版，²² 由前引黃日新的〈序〉的說法也可得到印證。

據程公許1242年的後〈跋〉，開頭言「《玉皇本行集經》近歲天樞張上相託鸞為之注解」，此〈跋〉在1242年寫定，距1221年天樞張上相在蓬溪縣真一壇託鸞為之注解出版，²³ 時間不過二十年，所以稱「近歲」。1242年猶子任的版本形式，此〈跋〉交代根據的乃是子任避地遠來臨安，所攜帶出蜀的「鄉人前彭山主簿孫文煥所校定注解經本」。這個版本是孫文煥的新校本，其校正對象有可能是1221年出版的張良註解本，或是1225年梓潼帝君再校正數字新版本，筆者認為應以後者較有可能。又「中間所刊龍章鳳篆，皆以藏教經本訂正，可信不誣」一句，因為此時《玉皇經》尚未被收入《道藏》中，所指的是利用北宋《道藏》中

22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又按明永樂本所載1225年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帝〈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序〉明言：「若然，則斯經也：九天副帥序其首，蓬邑諸生致其請，天樞上相定其訛，濮陽喻生廣其傳。愚今又從清州和邑太一普化壇生楊顯雄託鸞而記其盛，當附隆科儀而增大之，則千百載而下，此為全經將見。」

23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

的《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2:8a-38b)來訂正《玉皇本行集經》卷中的「天篆符文」(2:5b-34b)，即此稱的「龍章鳳篆」；而此所見到的「藏教經本」，應即是宋徽宗崇寧中、政和中兩次召搜訪道書，終成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本的《萬壽道藏》。²⁴然其稱「中間所刊龍章鳳篆」的「中間」二字，未明是在卷中經文之中，或是卷中經後作為附錄，無法與明永樂本、《正統道藏》兩版本作比較。²⁵又此〈跋〉言：「此經靈驗事蹟，前後不知其幾，蜀中所刊久已成編。今姑以蒙被恩貸一事，紀于下方，以堅正信之心。」可知如《正統道藏》張良本後所附刻的七則〈誦經感應〉形式，在蜀刻本中早已流行成篇，只是這蜀刻本不知是指一開始出世的版本，還是指1221年張良校本，抑或1225年梓潼帝君新科儀本？²⁶但此處程公許又新添一則猶子任蒙被恩貸而「精神頓復，疾遂去體」的感應故事，以其親耳所聞，紀於1242年猶子任版的〈跋〉中。

(二) 程公許二〈跋〉揭示了《玉皇經》出世背景與因緣

前面提及南宋理宗淳祐己酉(1249)出版的袁刻《郡齋讀書志》卷五〈附志〉，乃取之於趙希弁家所藏圖書，刪其重複，摭所未有而成；其中程公許除了為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刻蜀本《玉皇經》書〈跋〉之外，見於《郡齋讀書志》卷五上〈附志〉的記載，尚有為之〈序〉的《九天生神章經》三卷與親自代筆書〈序〉的《太上感應篇》八卷。²⁷程公許為《九天生神章經》題〈序〉，自稱「玉局散吏」，這一名稱蘇東坡在北宋神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初一日所撰的〈九成臺銘〉前的〈小序〉早已用過：「紹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東坡全集》卷九十七)另程公許在清人阮元編錄的《兩浙金石志》嘉熙二年(南宋理宗，1238)的〈宋程公許等題記〉，則自署「雲臺散吏眉山程公

24 陳國符，〈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鑄版〉一文考證甚詳，此部分收錄於《道藏源流考》，頁135至156。

25 按明永樂本即按天樞上相註說，而將《正統道藏》張良本這一部份(2:8a-38b)移至卷中經文後；但沒有《正統道藏》張良本的「五方天篆」(抄錄自《五老赤書真文》天篆)(2:5b-34b)，只有保留《赤書玉訣妙經》中的譯文部分。

26 前引〈仰有大跋〉已謂：「近得東蜀正本(嘉熙四年，1225)，看詳卒章，該載應驗事蹟三十餘條，有生死患難、兵刃、商賈、科第之人，凡有敬仰，皆蒙其惠，誦之使人凜然。」

27 《九天生神章經》3卷：「右絳州沖虛觀道士王希巢隱賢解，玉局散吏程公許為之〈序〉，西蜀譙巖趙日休〈跋〉，朱文公嘗謂此經亦杜光庭所撰。」《太上感應篇》8卷：「右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所編也，希弁生父師同嘗為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曰：「趙公所序，禍福善惡之報為尤詳，可謂愛人以德者。余嘗守袁，喜袁人之樂於趨善，因閱是〈序〉，矍然起敬，而程公許、湯中維書之。」

許」。²⁸

從「玉局散吏」與「雲臺散吏」來看，程公許應與蘇東坡一樣對道家頗為嚮往，同時也關心當時道教的活動，才會親自為道教典籍《九天生神章經》寫〈序〉，為《玉皇經》兩刻本寫〈跋〉，以及為趙希弁生父趙師回代筆為《太上感應篇》書〈序〉。而程公許應被趙希弁尊為同父執長輩，所以趙希弁請為其生父寫墓誌銘，對其生平著作也知之甚詳：「滄洲先生《塵缶編》三十五卷、《內外制》二十四卷：右程先生公許之文也。先生字季與，眉桂枝人，嘉定辛未進士，嘗以禮部侍郎兼侍講。聖上親御翰墨，以『桂枝永芳世家』及『南山滄洲』字賜之，臞軒王邁為之〈序〉，其集希弁生父〈榭倅墓銘〉，先生筆也。」（卷五下〈附志〉）此資料與《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比較：「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宣化人（今四川宜賓西北）。嘉定四年（1211）舉進士。」嘉定四年（1211）即嘉定辛未年，所相差的本籍應是眉桂枝（眉州桂枝人），敘州宣化應為寄籍。

趙希弁除了掌握程公許的重要著作外，一些參與道教活動所寫的序跋文章也格外用心留意，並典藏其所寫序跋之相關道教典籍；有可能趙希弁同其父親，也與程公許一同關心、參與相關的活動。²⁹從這一點來看程公許1240年的〈玉皇經跋〉，指出《玉皇經》出世的因緣背景乃是「蜀敵難」，以及由七曲老人梓潼大帝託鸞書出，其可靠性是非常確實的：

蜀敵難，七曲託鸞大書，以此經勸誘課誦。其有深信而持念不輟，感悟而改過遷善，不為無人：或身被鋒鏑而得不死者，或舉家被執而得免者，或遇賊兵而彼若罔見者。大夫、士避地遠來，為公許歷歷言之，皆非誕妄。

程公許是四川人，從小對梓潼帝君的信仰必不陌生，南宋理宗嘉定四年（1211）舉進士，據《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所記，端平初年前（1234）任官也都在四川：

28 清人阮元編錄《兩浙金石志》卷11〈宋程公許等題名〉：「雲臺散吏眉山程公許自武林過吳興，訪郡太守東平劉長翁，命其子儒珍偕。」據《宋史·程公許傳》嘉熙二年（南宋理宗，1238）時，程公許正因被彈劾去職。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頁10466。

29 本傳言：「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對照陸心源、伯剛甫編纂的《吳興金石志》卷12〈回仙觀記〉，自署「淳祐九年（南宋理宗，1249）歲在己酉十月望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記」。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頁10818。

嘉定四年（1211）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闕中；制置使桂如淵遁，³⁰三川震動，朝廷擢李埴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

此段傳文所提到程公許任官的地方：華陽、綿州、崇寧縣、簡州、隆州、闕中與施州等地，依南宋時期的〈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地圖來看，³¹除施州在蜀東之外，皆距離成都附近不太遠（距離蓬溪縣以地圖測量也僅百餘公里）。所以其對於蜀地軍民如何抵抗從北侵蜀的金兵，當時兵戈戰亂的慘烈，人民對此劫難的恐懼與之後流離失所，以及戰爭帶來的瘟疫與種種災難問題，當地身處敵難蜀地的知識份子與民衆如何解讀與面對？由於其身歷其境，其記載用語的可靠性就值得信賴與深省。

「大夫、士避地遠來，爲公許歷歷言之，皆非誕妄。」表明程公許此時在臨安〔按端平初（1234年左右）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大夫、士子避地遠來者如前所引1242年〈後跋〉中的猶子任等。這些逃難的大夫、士人，不僅跟程公許講述其前轉誦《玉皇經》的種種感驗事蹟，³²並且攜帶各自原先不同的蜀刻本《玉皇經》來到杭州，不僅使得梓潼信仰隨著移民逐漸往東南地區擴散傳播，又因應知識份子科舉的需要而建廟奉祀，³³也促成了臨安府承天靈應觀所刻蜀本《玉皇

30 《宋史》卷41〈本紀第四十一·理宗一〉：「〔紹定五年，1232〕夏四月癸亥，以寶章閣直學士桂如淵頃帥蜀日北兵攻城，不能謀合死守，而迫致軍民罹殃，反以聞詔褫職罷祠。」

31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頁69-70。

32 如故宮黃綾本後附感應故事之第26則〈劉天澤免兵難〉，其敘述發生的時間即在稍後之南宋理宗端平丙申年（1236）：「端平丙申，各躡兵犯蜀，有眉州丹稜縣東館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玉皇經》，終如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躡遇，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誥。躡人連發數矢，如有障隔，射經不中函；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躡乃奔馬，劉遂解脫。人謂經功之報，俱不信歟！故經中所謂：『若在軍陣，默念是經，惡賊退散之驗。』」

33 明人田汝成（1503-1557）撰《西湖遊覽志》卷12〈南山城內勝蹟·吳山〉：「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神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二年（宋哲宗，1087），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1237-1240），蜀破，民多徙錢塘，而蜀人车子才（南宋理宗官吏，進士出身）等請立廟於吳山，其旁立二童，俗稱天鵝、地啞是也。……徐一夔作〈疏〉云：『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關於宋代梓潼神的發展，可參考森田憲司，〈文昌帝君的成立——地方神から科舉の神へ〉一文，討論了文昌帝君從地方神到全國科舉神的歷程，收錄於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頁389-418。另Terry Kleeman, "Wenchang and the Viper: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National God"

經》的問世。所以南宋度宗時宰相馬廷鸞（1222-1289）所撰的《碧梧玩芳集》卷十七〈梓潼帝君祠記〉，也特別點出先有金兵侵略之蜀難，而後加速梓潼信仰往東南發展與建廟奉祀的因果關係：「梓潼當兩蜀之衝，帝君故蜀神也。……自吾有敵難，岷峨悽愴，君之靈與江俱東，今東南叢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吳山者，天華龍燭，晝夜嚴供。」

三、故宮黃綾本對《玉皇經》版本流變的貢獻

由於故宮黃綾本保存了程公許二〈跋〉的可靠寶貴史料，經縝審考證後曾撰作〈《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一文，結論如下：《玉皇經》出世的時間，衡之於當時的史傳記載，最合乎程公許所說的「蜀敵難」真實情境，莫過於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與十一年（1218）之間的金兵侵蜀史實；此正是作為「救末劫」的七曲梓潼帝君託鸞以降筆行世的時機，因為《玉皇經》正具有救劫與安鎮的經德力量，以及勸誘世人積德行善以持經課誦感應的善書功能。進由故宮黃綾本所保留的誦念《玉皇經》文前的「啓闕」文字，比對《正統道藏》本《文昌大洞仙經》卷一、卷二，證實了二者出自同一系統；可推論《玉皇經》扶鸞出世的地點應在蓬溪縣，且由劉安勝後輩的乩手扶鸞書出。

如果這樣的論證具有說服力，則故宮黃綾本在道教經典史上的貢獻就格外突出，因為據此一版本留下的諸多訊息，有助於解決研究上的困境，釐清千古之謎。除得以考究最初版本的形式、成書背景與因緣外，經由元人黃日新對當時湖南地區流行的《玉皇經》版本的校正，也可以掌握南宋中期到元初《玉皇經》版本流變的概況。另外其後所附的四十四則誦經感應內容，不僅可追索其作為附錄形式的軌跡，也藉著內容的比對可釐清一些問題，且對黃日新之後的相關版本流變考證具有相當的貢獻。

（一）南宋中晚期《玉皇經》版本的流變

根據故宮黃綾本所保存的資料與明永樂本記載，以及筆者的深究論證後，可

共分7章，主要探究了文昌帝君從地方雷神發展到全國文昌信仰的演變脈絡與相關信仰儀式；另“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則提出了許多文昌神格發展與轉變的歷史詮釋觀點；又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一書按內容分研究、翻譯和解說三部分。

歸納南宋中期到南宋末，所見《玉皇經》重要寫本的時間、刊刻者因緣與其形式概況如下：

(1) 1218年最初寫本：四川蓬溪縣劉安勝後輩的鸞手，藉由梓潼帝君扶鸞書出，以救「蜀敵難」的末劫情況；此最初的原本《玉皇經》形式，應是卷首有天猷副帥冲和應善天尊普化天尊降序、未分章、未註解的三卷「白文寫本」；〈玉帝誥〉的位置在「按法以傳」之下，而非卷二卷首，符篆真文置於卷二經文中。³⁴

(2) 1221年蓬溪真一壇天樞上相張良校正刊本：從1218年到1220年兩三年處在戰亂中的蜀地軍民，傳抄轉誦由蜀地保護神梓潼帝君降鸞書出的《玉皇經》，其情況必是熱烈而廣泛，不同的寫本紛紛行世，這就是張良所指稱的《凡本》、《舊本》與《一本》等用詞意涵。四川蓬邑縣真一壇生傅德普與邑士趙燦等人，秉啓念誠，具詞飛奏三天，乞委天樞上相化筆校正；且推算其扶鸞校經與繕板始於1220年三月，完成於季秋九月，並於1221年出刊。這個版本沒載刻天猷副帥冲和應善天尊普化天尊降序，但附有〈三天門下校經詔文〉、〈天樞上相辭表并所降請辭之意〉、〈三清再詔〉、〈天樞上相發明誦持大義并述校經之意〉與天樞上相〈奏陳表文〉，卷上共分十七章，逐章校正註釋，卷中與卷下不分章，各有四、五段註解；並卷中《五老赤書真文》的篆字與《赤書玉訣妙經》的譯文，移至卷二經文之後，另是否有附錄誦經感應尚無明證。

(3) 介於1221年至1225年的《正統道藏》張良刊本：與1221年蓬邑真一壇刻本不同者，即後附七則〈誦經感應〉，而抄錄自《五老赤書真文》的篆字與《赤書玉訣妙經》的譯文，仍置於經文中未移動，應是反映已經張良校正，又未來得及更動新鑄新版的狀況。

(4) 1225年梓潼帝君校正刊本：此新版根據的舊本是1221年濮陽喻生廣傳的蓬邑真一壇本，並且再根據清州和邑太一普化壇生楊顯雄託鸞紀盛；除梓潼帝君再更正了八處經文之外，又增加作為入轉經文前，科儀進行時所需要的「請神啓闕」經文，以及轉誦經文完畢，最後的「謝誥」文字，成為新版科儀本的「全經」。其前有天猷副帥冲和應善天尊普化天尊降序，卷三經文後有〈元皇帝君跋〉（題「太歲庚辰年季秋甲子玉堂學士張跋」）與《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序》（題「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帝 張撰」），並附〈校正〉，題「七曲老人再書」，

34 明人周琦撰《東溪日談錄》卷5〈祭祀談下〉載：「〈玉皇誥〉，宋徽宗所撰。」

以及附錄誦經感應故事三十餘則。

(5) 1225年稍後《正統道藏》白文刊本：由於《正統道藏》張良本逐章校正註解明顯更改的地方，無一例外地都出現在白文本之中，所以晚於張良本；又完全依照1225年梓潼帝君校正本修改，所以有可能是1225年新版全書的「白文經文版」，其成書上限時間是1225年。

(6) 1240年臨安府承天靈應觀蜀本：有南宋程公許1240年〈跋〉，指出最初《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蜀敵難，七曲託鸞大書，以此經勸誘課誦。」並交代「《玉皇本行集經》有天樞上相張真人校正表文，及逐章注解，敘述誦持大義；北極天猷副元帥爲之〈序〉，七曲靈應張大帝爲之〈跋〉，發揚奧旨，開度天人，詳且盡矣。」依此內容，應接近1225年梓潼帝君校正後的全本。

(7) 1242年猶子任刊本：有1242年程公許〈跋〉言：「先是子任避地遠來，篋中攜鄉人前彭山（四川眉州彭山縣）主簿孫文煥所校定注解經本出蜀，誦持惟謹；中間所刊龍章鳳篆，皆以藏教經本訂正，可信不誣。視今所刊，尤爲詳盡，子任用是捐金命工，悉加改正，俾見誦持，同獲無邊勝利。」按此可推知，孫文煥應根據1225年梓潼帝君校正後的全本再校正；而〈跋〉又言「此經靈驗事蹟，前後不知其幾，蜀中所刊久已成編」，可知此刊本也必定附錄誦經感應故事，而猶子任誦經感應，則程公許則特別紀於〈跋〉中，以堅正信之心。

(8) 1247年仰有大刊本：按故宮黃綾本〈黃日新序〉：「今來日新得之仰本，自抽經俸，板行于世，就抄錄程學士所跋，仰居士施經感應因緣，刊于卷末，庶知來歷。至于天篆符文密呪，乃上學之士，佩服修行所用，萬中無一，故不翻行。」黃日新稱此爲「正本」，又謂「今日新得仰本四十件感應，即採諸經新驗者數端，用廣其傳。」所以以今日故宮黃綾本所見結構經文，扣除黃日新〈序〉與〈校勘記〉，以及1248年後出現的誦經感應故事與神名稱號，大體可恢復仰有大的原樣。

(9) 1272年周元禮刊本：據黃日新〈校勘記〉：「上相校正玉經表章符篆，咸淳壬申（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間周元禮施經，在後諸處刊此大樣經本。」「檢照此經，欠副元帥普化天帝序，及欠上中卷未釋文，止有下卷釋文，經末應驗事蹟闕少。」則此版本似接近1221年蜀本，但少了卷上與卷中經文張良的校正釋文。

(二) 元初湖南流傳的《玉皇經》版本與校正

前文考證黃日新的官職是元朝湖南潭州路玄學的主管負責官員，所以其能掌握到湖南地區所有《玉皇經》出版的狀況，並進行仔細的校正；由其〈校勘記〉所載，光湖南一省所見不同刻印《玉皇經》版本作為功德者，就高達十數樣之多，每次刷印動輒上千甚至上萬本，可見元初印刷術之興盛與《玉皇經》作為善書之流行。而為了校正當時他所見十多種不同版本，黃日新在實際的校正題記中，引用他在元初所見的《紫微金格》為對校本，並特別在〈序〉中指出《紫微金格》的部數與包含的經名卷數：

蓋《紫微金格》第一部：《洞玄靈寶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一卷、《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一卷，此二卷即《玉經》中〈太上天光明圓滿大神呪品〉在內；《元始靈寶五帝真文玉訣》即〈元上青精呪〉、〈五帝真符〉、〈符呪〉在內。第三部內出《九天生神章》，第七部內出《度人上品妙經》，第八部內出《三元品誡經》。今之誦者施者，不知經自有祖，擅改不一，各執私見，承訛輦舛，至十數樣，無所攷憑。

這《紫微金格》在道教經典史上是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依大淵忍爾《靈寶經の基礎的研究——敦煌本靈寶經目を中心として》一文的整理與研究，《敦煌道經》中頁2861、2256就保存了宋文明³⁵在《通門論》所提及的〈紫微金格目〉。據宋文明在元始舊經〈靈寶經目〉後言：「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今分為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十部妙經三十六弓（卷），皆剋金為字，書於玉簡之上，題其篇目於紫微宮南軒。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記其文。諸天大聖衆，依格齋月日，上詣玉京，燒香旋行禮誦，禮天文也。」³⁶此〈靈寶經目〉應是劉宋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呈的〈靈寶經目〉，而其中所言之《紫微金格》應即東晉末《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所提到《金格》：「玄科有禁，不得便傳。君自可詣靈都紫微上宮，視天音於《金格》，取俯仰於神王也。然後當使得備天文，以總御元始之天也。」（1:7a）對照〈紫微金格目〉，

35 宋人李昉（925-996）等撰《太平御覽》卷666〈道部·八道士〉：「又曰：宋文明，字文明，吳郡人也。梁簡文（549-551）時，文明以道家諸經莫不敷釋，撰靈寶經義疏，題曰謂之通門。又作太義淵，學者宗賴，四方延請。長於著撰，訥於口辭。」按此宋文明活動於南北朝梁簡文帝（549-551）時期，乃著名的靈寶法師。

36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78-79。

宋文明標記「第一篇目缺佚；第三篇目有《九天生神章》一卷已出；第七篇目有《無量度人上品》（一）卷已出，第八篇目有《三元戒品》一卷（已出）」；又按大淵忍爾考證，第一篇目所缺的即是已出的《洞玄靈寶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一卷與《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一卷。

可知元初黃日新所看到、所認知的《紫微金格》經書，正與宋文明所記載的〈紫微金格目〉完全相符；³⁷此即表示此一目錄從宋文明《通門論》、敦煌本以至元初，一直被保存在道教內部中傳承，此事實因故宮黃綾本的資料而得到印證。而且黃日新以當時所見相關靈寶經典，落實於〈紫微金格目〉的順序與內容，直接稱呼此批靈寶經典就是《紫微金格》，應反映元初當時道教內部的共識；並以當時所見《紫微金格》內相關經書版本，特別是《赤書玉篇真文經》與《赤書玉訣妙經》作為考憑的依據，來作校正流行的各種《玉皇經》卷二的相關經文，以印證〈序〉中所言：「蓋紫微金格，乃道門第一品之妙書也」的認知。

黃日新說明遵守相關誦經戒律態度時，更以宗教之心憐憫誦經者的處境：「今觀誦經過律：漏一字為一過，漏一句為五過，釋音乖背，字樣差錯，一字為五過。竊見誦經之士能幾？」所以他特別就當時流行的版本一一指出錯誤，並提出具體的建議：「今後應有刊施之家，必須要兩部，一部上板，一部與匠者照證，庶得無差；³⁸刊訖，仍先印一部，點檢一遍，有訛便改，方行印施。」更希望藉由度己而後度人的關懷，使誦經與刊施者皆成無過之人：「今將諸處經本，指出舛訛，誦持者可正，刊施者可改，悉為無過之人，共證無為之果。」其所見刊施善信、版次時間、印施數量、經本流變與與特殊形式（不含詳細校正），可分類歸納如下：

1. 以1272年周元禮大樣經本為底本者有五處：

- (1) 長沙李文遠居士至元庚辰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刊施。
- (2) 醴陵州傅氏孺人大德癸卯年（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刊施。

37 2008年8月底道經讀書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討論時，承蒙柏夷（Stephen Bokenkamp）、鄭燦山與張超然等教授提醒，並核對《敦煌道藏》中宋文明元始舊經〈靈寶經目〉資料後而得的結果，特此誌謝。

38 為求無誤，訂有相關罰則，而匠人的回話，保留了當時信實的史料：「官司刊藏經，錯雕一字，罰鈔二錢伍分，尚有錯刊。」

(3) 湘陰州鄧天與居士至大巳（己）酉年（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刊施：除經內誤字外，有〈序〉（此應為天猷副元帥〈序〉）。

(4) 湘潭州周彥富至大庚戌年（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刊施千部。

(5) 耒陽州張鉉徵士至大庚戌年（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刊施萬部。

2.1297年常德府石守禮刊本：大德丁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刊板印施：此版本黃日新特別指出其與其他版本不同之處：「『符水上龍，召山送雲。』此乃《紫微金格》（按此指《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二句（在1:14b），如此衆本皆同，惟有石本誤刊：『符水召龍，上山送雲。』」另「經後新刊五方符篆，與潭州經本（按周彥富本）筆法多差。」

(1) 岳州路華容縣馬世華、馬如龍刊本：大德乙巳（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刊板，庚戌年（1310）施五百部，有經末感應。

(2) 前湖南監司相公夫人婉真刊本印施一千部。

(3) 常德路龍陽州吳鎮卿大德乙巳（1305）印施。

3.古本《玉經》：潭州集真壇生隗守和居士刊小樣古本《玉經》：此本特色是「却攙入樞相表語，前後蓋□。正經後有七曲老人再書云：『此經自子房校正，及吾審訂之後，無得擅有竊議，少加竄易之語。』」按黃日新如此描述，則加入的部分是1225年題為「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帝 張譔」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序》內容部分（保存於明永樂本）。但此版本由於錯字太多，又黃日新指出：「經中錯了五老名銜，³⁹其罪不輕，請於行靈寶大法法師講明。」所以嚴肅地主張：「此板可付丙丁」。

4.未指明版本源流者：

(1) 滇川益陽州西溪市士庶共刊經板。

(2) 思州田宣慰相公延祐庚申（元仁宗延祐十三年，1320）刊板印施五百部。

(3) 瀏陽州士庶集刊中樣經本。

39 依黃日新考證此本將「中央元靈元老誤作五靈元老，北方五靈元老誤刊玄靈元老。」按查《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作「中央玉寶元靈元老」，「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元老」，與黃說相符。

(4) 潭州在城土庶共刊中樣真經，常武郎中曹元善外郎印施。

(5) 衡州省魁坊大街吳應隆居士刊小樣直經印施。

(三) 四十四則誦經感應故事

《玉皇經》後附錄誦經感應的形式，一般所看到的應是《正統道藏》張良本後所附的七則，而此版本據筆者考證，其時間可能接近蓬邑真一壇1221年張良校正後，尚未科儀化的較純樸版本，即介於1221年至1225年的文本。因為根據〈仰有大跋〉的說法：「近得東蜀正本，看詳卒章，該載應驗事蹟三十餘條，有生死患難、兵刃、商賈、科第之人，凡有敬仰，皆蒙其惠，誦之使人凜然。」此「東蜀正本」即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25）梓潼帝君的校本，其載錄的應驗事蹟既有三十餘條，則較早的版本已存在七則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正統道藏》張良本自註又強調：「經中感驗，自上古隋、唐以來古今事實，舊嘗備載藏本。續略摘數事，附于卷後，以證此經功德不可思議。」(3:21a)此「續略摘數事」一句，明確表明之前版本已存在誦經感應。而此類誦經感應故事，後代版本或有爲了省錢而闕之，如〈黃日新序〉所言：「及況潭城誦持《玉經》有數萬部，多闕誦經感應。一施者慳費省紙，圖其價輕，一委文字鋪印造，亦如此計筭，是以闕之。且如每經感應，所印不過紙三張，所費微眇，而施者慳吝，兩相苟簡。許經之時，十分至誠，還經之際，又且省吝，甚可怪焉。」或有廣傳功德，而加以增刪，如〈黃日新序〉自謂：「今日新得仰本四十件感應，即採諸經新驗者數端，用廣其傳；以斯功德，上報四恩，下資眷累，解冤懺罪，長福消災，長賴人天，普資利益者。」歸納此類經後附錄誦經感應的數目，明確記載者，從七則、三十餘則、四十則而致故宮嘉靖黃綾本所見的四十四則（此不含猶子任與仰有大自述之兩則），以及《重刊道藏輯要》箕集《直解本》卷中、卷下註解文中引證的四十二則。

故宮嘉靖黃綾本所保存的四十四則誦經感應故事，對道教經典史的相關研究，主要凡有三大貢獻：⁴⁰一是由第一則〈法師張承光受西王母經本〉與第三十三則〈王少府仙人傳授經本〉內容，核對「天猷副元帥冲和應善天尊普化天尊撰」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前序》，與明永樂本1225年九天開化主宰靈應大帝所降

40 進一步的研究將另題發表，此僅提出在經典文獻上的貢獻。

撰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序》所保留的訊息，不僅可推論其爲了夸言《玉皇經》傳授的神聖神秘與久遠，乃於扶鸞之初即「創造」經由西王母口傳、九天玄女參正的神話，更可考證出1218年所出的最初扶鸞經版就是三卷本的形式。⁴¹ 雖然其皆是明顯改編自中晚唐、武徹所寫的《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記》，⁴² 但無損其在《玉皇經》版本流變研究的價值。

二是《正統道藏》張良本後所附七則誦經感應，除〈竇德玄〉一則，未保存於故宮黃綾本中，其餘其故事結構內容重點，依序分別見於編號18、16、15、23、6與17等。（如附表）此可表示其有一堅韌的源頭，盡量保存前面的資料；但隨著多元版本的流傳，誦經感應的資料庫也相應多元累積，因此後代刊經者，當然也可作選擇增刪的考量。三是藉由誦經感應故事的比對，不僅可掌握增刪的痕跡與意圖，更可印證相關版本的流變，如《直解本》卷中、卷下註解文中，共引證誦經感應故事四十二則，其中出自故宮黃綾本者三十一則，他處者有十一則。見於《重刊道藏輯要》箕集《直解本》卷中〈玉皇功德品第三〉頁21至頁30者，依序爲故宮黃綾本誦經感應故事，編號爲20、19、18、31、22、8、24、28、10、11、33、25與44等十三則。見於《重刊道藏輯要》箕集《直解本》卷下〈報應神驗品第五〉頁9至頁24者，依序爲故宮黃綾本誦經感應故事，編號爲3、4、2、39、34、13、23、21、37、15、26、17、7、40、14、32、6與16等十八則。（如附表）因此可以推知，當《直解本》作進一步校正註解時，所看到、並據之比對的版本，從其引用到第四十四則〈黃琛刊經陞遷〉，應是明憲宗成化九年（1573）的故宮版本（非黃綾本）。

結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圖書處所珍藏的罕希善本《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是明嘉靖四十年的「黃綾定本」。此版本可說是道教《玉皇經》研究中的重要版本，因爲保存了元人黃日新的〈序〉與〈校勘記〉，不僅詳述其相關版本的來源；並利用《道藏》相關資料與1248年仰有大刻本爲底本詳細校正經文，逐一指陳當時所見湖南《玉皇經》相關版本的形式與訛誤。還抄錄了不載於世本的

41 請參筆者〈《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一文。

42 請參筆者〈《正統道藏》本《玉皇經》成書時間考定〉一文。

南宋程公許兩篇〈玉皇經跋〉，為後人留下可據以考證的珍貴史料。程公許的這兩篇〈玉皇經跋〉，不僅可據考四川蜀本的形式，瞭解其流變的軌跡；更揭示了最初《玉皇經》出世背景與因緣，乃因「蜀敵難，七曲託鸞大書，以此經勸誘課誦。」由此提供的豐富的訊息，深入考證與解讀後，有助於解決研究的困境，釐清諸多疑惑。

再者經由故宮黃綾本所保留的誦念《玉皇經》文前的「啓闕」文字，比對《正統道藏》本《文昌大洞仙經》卷一、卷二，證實了二者出自同一系統；可推論出《玉皇經》扶鸞出世的地點在蓬溪縣，且由劉安勝後輩的接真乩手扶鸞書出。根據刻校者黃日新所保存的資料，再對照其他相關版本的研究，以及其作為元朝湖南潭州路玄學的主管負責官員的身份。我們不僅可證實〈紫微金格目〉至少從宋文明《通門論》、敦煌本以至元初，一直被保存在道教內部中傳承；更瞭解從《玉皇經》一出世到元朝初年的發展與流變情形，以及重要寫本的時間、刊刻者因緣與其形式概況；還掌握了湖南地區所有《玉皇經》出版的狀況，印證元初印刷術的興盛與《玉皇經》作為善書流行的熾熱風氣。另故宮嘉靖黃綾本所保存的四十四則誦經感應故事，在道教經典史的相關研究上，也提供了承先啓後的關鍵角色：上可考察其故事的來源與變化的情形，探索其中內含的意義，下可追索明清之後版本保存的痕跡，以明瞭相關版本的關係，具有重要的價值。

附表：《玉皇經》誦經感應所在版本比較表

| 《正統道藏》張良本 《玉皇經》 | 故宮明嘉靖四十年黃綾本《玉皇經》 | 《重刊道藏輯要》箕集 《直解本玉皇經》 |
|--------------------|---------------------------|------------------------|
| | 1〈法師張承光受西王母經本〉 | |
| | 2〈劉滿誦念 玉帝聖號感驗感應一〉 | √卷下 |
| | 3〈王侁失目請人寫經目復明感應二〉 | √卷下 |
| | 4〈趙脩復被冤訴許造經而得生〉 | √卷下 |
| | 5〈李去病請王肇寫經而寫經退筆能伏魔鬼〉 | |
| √〈李脩〉 | 6〈李脩寫經感筆上有圓光現〉 | √卷下 |
| | 7〈李丘一田氏參軍時 玉皇經所殺物命盡得升天〉 | √卷下 |
| | 8〈于季回被狐狸誘入舍默誦 玉皇經口吐金光而得脫〉 | √卷中 |
| | 9〈唐仲本泛海船溺而得藏經木（按：本）之力遂達岸〉 | |
| | 10〈豆盧夫人持經神燭自明〉 | √卷中 |
| | 11〈舍人張承福及道士李道真持經而陰司不追〉 | √卷中 |
| | 12〈張益誦經父母得生天宮〉 | |
| | 13〈馬敬神人指示傳本〉 | √卷下 |
| | 14〈趙居易高純被追而受罪金光罩體〉 | √卷下 |
| √〈慕容文遠〉 | 15〈慕容文遠被押持經而得退〉 | √卷下 |
| √〈銀山老人〉 | 16〈銀山老人持經火不延燒〉 | √卷下 |
| √〈呂文展〉 | 17〈呂文展持經齒落更生天人敬禮〉 | √卷下 |
| √〈陳璟〉 | 18〈陳璟入海船溺而得經力赤龍救護不失損〉 | √卷中 |
| | 19〈李惟玉持經得槽遂獲泊岸〉 | √卷中 |
| | 20〈張齊丘持經叛兵不能致亂〉 | √卷中 |
| | 21〈陸康成持經騎射不傷〉 | √卷下 |
| | 22〈宋懿臨刑復生〉 | √卷中 |
| √〈司馬喬卿〉 | 23〈司馬喬卿感生芝草〉 | √卷下 |
| | 24〈陳文達誦經救人疾苦多致吉祥〉 | √卷中 |
| | 25〈盧重誨救網中罪囚生天〉 | √卷中 |
| | 26〈劉天澤免兵難〉 | √卷下 |
| | 27〈程萬里免水厄〉 | |
| | 28〈范輝為妻梁氏誦經而昇天宮〉 | √卷中 |
| | 29〈李元一持誦 玉皇經女復生〉 | |
| | 30〈張政暴死遇教持經道士而再生〉 | |
| | 31〈甯勉常持 玉皇經而賊兵字潰散〉 | √卷中 |
| | 32〈任自信持經龍王敬重〉 | √卷下 |

| | | |
|--|--------------------|------|
| | 33〈王少府仙人傳授經本〉 | √ 卷中 |
| | 34〈李氏持經遠年尸不壞〉 | √ 卷下 |
| | 35〈朱仙夢何應龍大魁川省〉 | |
| | 36〈周乾妻被虜復歸〉 | |
| | 37〈譚周父值亂獲免〉 | √ 卷下 |
| | 38〈譚開夜宿旅店潛消縊婦之恐〉 | |
| | 39〈黃德父感應施經之戒〉 | √ 卷下 |
| | 40〈衡邑老儒誦誥靈驗得免溺鬼之厄〉 | √ 卷下 |
| | 41〈孫侍榮施玉誥免遭回祿〉 | |
| | 42〈吳宗珍男病劇許施玉經而得安〉 | |
| | 43〈刊玉皇經顯應〉 | |
| | 44〈施玉經伏惡賊退散得祿職陞遷〉 | √ 卷中 |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刊本，明永樂二十二年四十四代天師序，李顯光收藏。
- (明)《正統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明)《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明嘉靖四十年黃綾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
- (清)牛誠修輯錄，《定襄金石考》，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 (清)阮元編錄，《兩浙金石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 (清)陸心源，《吳興金石志》，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 (清)《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直解》，《重刊道藏輯要》本，成都：巴蜀書社，1995。

二、近代論述

-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續）〉，《道教文化》，4卷8、10、11期。
-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臺北：古亭書屋，1974。
- 張雪紅，〈論宋代提舉學事司的創制與其在教育傳播中的督導功能〉，《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5卷6期，2005年11月，頁195-199。
- 謝聰輝，〈《正統道藏》本《玉皇本行集經》成書時間考定〉，投稿《清華學報》，審查中。
- 謝聰輝，〈《玉皇本行集經》出世的背景與因緣研究〉，《道教研究：宗教、歷史與社會》，創刊號。
- 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宋代收藏道書考·宋代館閣及家藏道書綜錄》，London: Ithaca Press, 1984。
-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東京：創文社，1997。
- 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擧の神へ〉，收錄於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389-418。
- 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の確執〉，收錄於氏著《元史釋老傳研究》，京都：朋友書局，1978，頁142-202。
- Kleeman, Terry. "Wenchang and the Viper: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National Go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8.

Kleeman, Terry. "The Expansion of the Wen-chang Cult."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45-73.

Kleeman, Terry. *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Lord of Zit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The Value of the Imperial Text of *Yuhuang Jing*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aoist Scripture

Hsieh Tsung-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has collected an imperial text of the *Yuhuang Jing* published in 1561. This reliable text may be an important ver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Yuhuang Jing*, because it consists of reciting ritual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he value of this text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aoist scripture are: 1. According to Cheng Gongxu's two postscripts of the *Yuhuang Jing* appended to this text, we can investigate the *Yuhuang Jing* published in Sichuan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Yuhuang Jing* through spirit-writing. 2. In the Yuan Dynasty, Huang Rixin expounded in his preface and emendation records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versions of the *Yuhuang Jing*, made use of *Daozang* to correct these versions, and pointed out the contents and faults of all versions of *Yuhuang Jing* he found in the Hunan area. 3. Contrasting the god-inviting part of *Yuhuang Jing* p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text, with chapters 1-2 of the *Daozang* of *Wenchang Dadong Xian Jing* (CT5), and find that both of them come out of the same system. Furthermore, we can infer that *Yuhuang Jing* was produced by the successor of Liu Ansheng Daoist-altar by spirit-writing in Pengxi County of Sichuan. 4. The 44 stories of miracles in response scripture recitation appended at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text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Yuhuang Jing*. They help us to investigate the versions of *Yuhuang Jing*.

Keywords: Daoism, Zitong, spirit-writing, *Yuhuang Jing*, Gongxu